

1100万违规集资的背后

核心提示

驻马店广播电视大学被人举报,其向教职员违规集资1100万余元,用于学校转型。

今年春节过后,一封反映驻马店广播电视大学(以下简称驻马店电大)非法集资的举报信被寄往国家信访局。

举报信反映,未经审批,该校向教职工以10%高额年息集资1100万,涉嫌违法。

集资背后,是驻马店电大急切转型的企盼,招生难已让该校发展“步履维艰”,对此,校方提出筹建新职业学院。

但在中央电大看来,转型伤害了电大四级办学体系的完整性和功能性,要求地市级电大停止向地方院校和普通高校的挂靠行为。

受此政策限制,再加上资金缺乏,让这个刚刚转型的学校不得不停下脚步。

违规集资1100万

3月份,这封对驻马店电大的举报信以“河南省人大代表王月梅”的名义寄出,随后,举报信被转至河南省政府,省长李成玉作出批示,要求驻马店市政府成立调查组调查此事,并将结果上报。

经过约月余调查,驻马店将调查结果汇报给省政府,认定举报信是假冒电大艺术系主任王月梅之名撰写,但举报内容被部分查实。

据电大有关教职工介绍,学校从去年以来,向全校200多教职工集资,普通职工每人5万元,领导每人10万元。

“校长在各种校内大会上放言,不予配合的教职工和领导班子成员,就地免职”。有教师介绍,借钱给校方的职工,每年可获得最高10%的利息。这样,驻马店电大两次共向职工集资1100多万元。

驻马店市高教科科长邹新民证实,电大集资确实没有履行相应的申报审批程序。

“但这并不属于非法集资。”驻马店市教育局副局长陈文启则认为,尽管电大集资没有审批,但面向的是内部教职职工,属特定人群,因此并不“违法”,但是违规了。

事实上,在学校集资的过程中,很多校外资金也通过教师流入学校,电大一位老师介绍,“一些家庭困难的职工都向亲戚朋友借钱交给学校。”

招生难

杜志傲,驻马店电大校长,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位50岁的处级干部冒险违规集资呢?“招生太难了。”5月16日,杜志傲在学校采访时反复提到这句话,从2001年他调任该校工作时,学校就已向所有教职工下达了招生任务。

以去年为例,按照校方规定,普通教职工需要招到5名学生,领导班子成员,则需要招9人。“晨练时,我都不忘问人家要不要上电大。”杜志傲说,学校规定,招一名大专生奖励200元,招一名中专生奖励100元,完不成任务,则一次性扣发200~300元奖金,而他自己为了完成招生任务,常常“见人就问”,就连来学校施工的包工头也不放过。

电大其他老师解释,他们为了完成招生任务,“把亲戚朋友都发动起来了。”杜志傲说,“即使这样,每年招生计划还是完不成。”另一方面,普通班的招生也不乐观。

“每年春节一过,电大领导班子就开始带队分头‘包县’招生。”去年,杜志傲带着两名老师,在人口上百万的上蔡县住了一个星期,跑遍了县里的4所高中,请校长和班主任吃饭,最后招到了30多名学生,已让这位校长十分满足。

而在其他一些小县,最后在高考志愿里填报电大的学生也只有八九个。最后的统计数据是,就全校而言,被录取的学生,真正能去报到的也不过70%~80%。

驻马店电大财务处处长邵翠平说,只有保证生源才能保住教师的饭碗,据其介绍,市财政局只拨付教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学校办公经费至少要支出100多万,只有靠多招生弥补。

电大文凭受歧视

“主要是电大文凭的含金量开始下降。”驻马店市教育局高教科科长邹新民说,电大分中央、省、市、县四级办学体系,形成于改革开放刚开始的1979年,一大批因为“文革”没能进入大学的人借助电大完成了高等教育,但现



在这种教育方式已不被人重视。他以本人为例说明电大毕业生的转变。1983年,他由单位推荐经过3年不脱产学习,拿到了电大的大专文凭,身份很快由工人转为国家干部。

“但现在不行了。”邹新民说,电大毕业生转干的政策在1988年前后逐渐消失,由社会组织的考试的高等教育和自考班质量越来越难以保证,对于电大、夜大、函大等成教毕业生,用人单位渐渐抱有怀疑和歧视态度。

“即使在公务员的报考资格上,现在也有相关学历水平要求‘普通高校毕业’的限制。”邹新民说。

同时毕业于电大的杜志傲,借助于党政管理专业学习,由一般职员提拔至市委秘书科副科长,现今,这位执掌电大的校长,也不得不为自己学校的命运感到无奈,“普通高校大幅扩招,考大学比过去容易,来拿在职文凭的人越来越少了。”

转型职业教育

转型发展职业教育,这是驻马店电大做出的破冰抉择。在驻马店市教育局副局长陈文启看来,“地市级电大多名存实亡,并入其他教育序列成为一种自救方式。”事实上,早在2005年,校长杜志傲就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办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该提案被列为当年政协的重点提案。

杜志傲提议建职业学院的背景是,国务院和教育部均要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河南省教育厅也要求“每个地级市都要建设一所高等职业学院”,但驻马店是该省18个地级市中唯一没有职业学院的地级市。

于是,由电大牵头筹建职业学院的决定,在2006年6月市政府的一次会议上通过,并列为当年市政重点工作。

有关方面给出的新建学校的蓝图是,正门迎面为两幢连廊贯通式办公大楼和教学楼,实验楼和图书馆分布两侧,背后体育场、篮球场、大礼堂兼食堂一应俱全,八幢学生公寓楼可容纳6000名以上的学生。

在杜志傲的原计划中,一期教学楼、办公楼、四栋宿舍楼可于今年建成,若申报验收顺利的话,明年即可招生,电大也将变身职校的一个内设机构。

杜志傲算的经济账是,作为电大,每年招收400名左右普通班学生,每生收费约4000元,除去向省电大交纳10%的管理费,20%的管理开支,结余130多万。

成人班每年招生1000多人收入100多万,除去上缴的管理费,最多能留下40多万,这样电大每年结余总共不到200万。

而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一期工程完工之后,将可以容纳学生3000人;3年以后,二期工程结束,将可以容纳6000人以上。

照此计算,一二期结束后,光普通班每年结余可达600万和1200万。

变身之后,普通班扩容带来的经济利益极为可观,而加大力度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教育经费。

此外,申办职业技术学院的成功,还将带给电大行政人事级别的整体升级,由正处级跃升为市政府和省教育厅统管的副厅级单位,相应的中级职称也将提升为高级职称,奖金、津贴等都会相应增加。

上亿元资金缺口

但问题是,市政府将此宏伟蓝图展现给电大的同时,也将资金难题摆在了杜志傲面前。工程按教育部关于职业技术学院建设的最低标准做了预算:三期总预算1.12亿元。

“但是市财政给我们的筹建经费只有1000万,而且要分3年支付。”杜志傲说。

杜志傲想到向城市信用社贷款,但电大尚有500万贷款未还,对方最多只贷给他60多万,再加上市财政已经到账的800万拨款和电大历年结余资金600万,“启动一期建设还缺3300万。”本来的一个希望是,将电大老校区和已并入电大的原财税干校,分别置换给市一中和驻马店财经学校,可以筹措3200万置换款,但因作价未能谈拢,置换还没有实现。

“万般无奈之下,我才想到了向教职工举债。”杜志傲说,学校答应两年后返还本息。“这个想法在向市政府相关领导口头汇报了之后,得到了准许。”杜志傲解释,确实没有

履行审批手续,他认为当地教育经费极为紧缺,向教职工举债办校的做法并不罕见。

电大路在何方

今年4月,在驻马店将调查结果汇报给省政府的时,市教育局也责令电大拿出还款计划,要求今年5月先还款100万,9月还款500万,2008年3月偿还最后500万。

驻马店市教育局虽然没有表示追究杜志傲的责任,但电大的转型计划不得不因还集资款推迟,杜志傲像像热锅上的蚂蚁。

而更让杜志傲着急的是,“教育部高层意思,电大不能转为高职高专,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有讲话精神。”2005年4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时任中央电大校长的张尧学在全国省级电大党委书记、校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的地方电大在向普通高校的模式发展,认为这样自己的权力可能会大一点,做起事来可能更方便一点……但是要是把系统分裂开来,就违背了资源共享的原则,就不能发挥有限资源的使用效果。”这个讲话在去年底形成了一个“不允许地方电大自主改制”的口头意见,“如果现在仍以电大的名义去申报职业技术学院,教育部肯定不会给备案”,杜志傲有些骑虎难下。

在驻马店电大的转型背后,是中国四级电大体系共同面临的发展难题,中央电大曾在冀、豫等7省调研发现,分别有五成和六成的市和县级电大,被当地高职、师范学院合并。

而在基层一些电大学校的负责人看来,电大转型似乎还牵涉利益问题。

按照此前规定,地方电大招生普通班学生和成人班均需要向上级电大交纳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其中普通班管理费上交省电大,成人班管理费由省电大和中央电大按比例分成。

而地方电大被合并或者改制为职业学校等,使自己掌握了普通班学生的发证权,也就不需要向上级电大交纳管理费,“同样有生源保证,电大也就不再想各种办法招成人班,势必影响上缴管理费的数目。”驻马店电大的老师说。

与此相关,2006年,中央电大取消了省市两级电大普通班的招生权,省市电大主要的财源被切断,大量师资和校舍闲置,又促使地方电大另辟蹊径,加速转型。

“中央电大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今年很快就要发布,规划中将强调‘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中央电大远程教育研究所所长张少刚说,将来在保留在职成人教育这个母体功能之外,为其他普通高校搞好培训和服务。

据《新京报》

时评

很焦急的老百姓也很无力

孩子们高兴了世界都是快乐的

“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社会上突然显现出对孩子们的关心和爱护。比如,各大商场不惜花钱在媒体打出广告——“迎六一,献爱心,全场大甩卖”;还有,有关方面的领导提前几天就到学校和幼儿园开展“慰问活动”,甚至也没有忘记给少年儿童带去一些慰问品,然后与幼儿教师一起开个像模像样的座谈会;另外,一些学校或者社会机构,还热火朝天地组织一些庆祝六一的文体活动,比如歌咏比赛、才艺展示,等等,热闹非凡,不一而足。实际是各有打算,互利不累。比如,那商家的“献爱心”,不过是想掏孩子们兜里的银子,而有关方面的领导也只不过是借“六一”为自己挣个面子,实际上给孩子们什么实事也没办。

孩子们还是有很多事情需要大人们去办的。比如贫困地区的失学孩子,我们“抢救”了多少?在危房、危地上课的孩子,我们真正关心和过问过吗?即使是城里,那些在“超载教室”里上课的问题,我们解决了吗?就是那天喊着要给孩子“减负”的问题,恐怕依然如故吧。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最近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事情,使我们的心至今还在隐隐作痛!一个月前,山西某县召开一个什么会,要让孩子们给大人们表演节目,可是领导们在主席台没完没了地发言,使台下的孩子们冻得瑟瑟发抖,有人将孩子们的照片发到网上,引起网民们对主席台上的大人們的强烈声讨。还有,在前几天在重庆某县,一个小学有7名小学生被雷击死,而这个学校所在地是雷电多发区,当地人都知道,可是就是没有人想到搬迁校址。如此这些,就连关系孩子们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危的事情,我们大人们都没办好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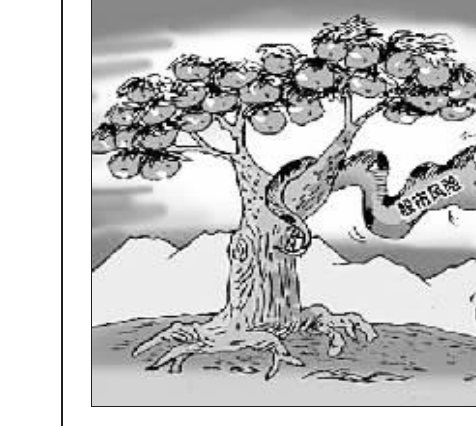
过去挂在大人们嘴上的一句话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话是很动人的,但是,在一些地方对孩子们的事依然是不上心、不看重,直至让孩子们付出惨重的代价。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我们拿准开,也不能拿孩子开,我们忽悠谁,也不能忽悠孩子。孩子们的事情,就是天字号的事情,不能有半点马虎,我们只能办快、办好,办得让孩子们满意。

现在,一些领导整天忙政绩、忙GDP,一些孩子的家长整天忙票子、房子、车子,忙这些也没错,但是,决不能忙得忘了孩子。要知道,什么政绩、GDP,什么票子、房子、车子,都是为了孩子,因此,还是真正想一想,我们如何为孩子们办点实事、急事吧。孩子们高兴了,世界都是快乐的! 王建章

近一段时间,厦门市的老百姓很焦急,因为有一柄达摩克利斯剑将要悬在他们的头顶之上。概括一下言之,就是厦门市要在海沧兴建一个重化工项目,这个离居民区仅1.5公里的PX项目存在泄漏或爆炸隐患,厦门百万人口面临生存危险。(5月29日《南方都市报》)

作为一座风景旅游城市,厦门之美,连不是厦门人的外地人也略知一二。现在完了,不应发展高污染化工产业之说,在此地不灵验了,浓重的化工阴影死死地罩住了这座岛城。

多数厦门的老百姓反对上这个危及他们生活的化工项目,这几天,百万市民疯传一个短信,相互告知,PX就是对二甲苯,



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市民与官员进行博弈,有良知的专家也在和官员博弈,继今年3月,中科院院士赵玉芬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反对厦门牺牲环境发展化工后,厦门大学一位教授表示,要根据环评法,起诉相关环保部门。而官员的态度则是:委员提他们的,我们不理睬。

好一个不理睬,看来抛弃绿色发展的GDP崇拜所产生的力量,实在是大得邪乎。一任官员,造福一方,这是古时就有的做官伦理。即便不能造福一方百姓,但也不能祸害他们。环境灾难竟可能由官员选择的明明白白会危害公共安全的化工项目而来,现实的复杂性、糟糕性,让人无

力到失语。说是一场博弈,市民竭尽全力表达自己的意见,专家把话语权用到极点,结果怎样?官员睬都不睬。

厦门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按一市民的话说,“随便冒个烟,全城都能闻到”。PX项目兴建,既终结了这个花园城市的美丽,也为它埋下了随时可能爆发的污染隐患。一些官员却因为这个项目有福了,催生GDP崇拜的内动力其实是个极简单的玩意儿,官员们了然于胸,老百姓何尝不心知肚明?他们拿官员没办法,因现实性如此,没有一个人会对PX项目的危害性承担终身责任。在痛感无奈的同时,老百姓只有一种命运:时时忧虑地看着那柄可怕的达摩克利斯剑。 罗金羽

漫画:股市凶险

漫画:股市凶险

最新统计数据 displays,有60%的投资者认为当前股市有风险,仅有25%左右的受访者认为当前风险仍不明显,另外有14%左右的受访者表示对当前市场风险程度的意识不明确。

因有超过60%的投资者认为“股市有风险”,并且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故当前市场无疑面临着极为严重的确定因素,因该部分资金随时可能受到市场的冲击而选择撤离。

根据近期新开户数的变化情况,估计投资者风险意识的增强,一定程度上或是受到管理层态度的影响。1996年,管理层通过新华社连续发出“十二道金牌”,引发大盘连续三天跌停;而今年以来,管理层通过不同方式,共计对市场直接或间接地发出八道“金牌”,其中包括央行四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上调存贷款利率、证监会连续发出两次风险提示。 据新华社

浙江大学教授柴放武在最新一期的《人民论坛》上刊文剖析了“弃官从商”现象。文章指出,官员在离任之后,虽然手中权力大大减弱,但仍然能利用其在任时结交的各种关系,把握好其在任时事先的“感情投资”,在离任后一并收获。这种权力与金钱之间的转换,催生了“权力旋转门”现象的大量出现。(中国新闻网5月24日)

随着反腐的不断深入和力度的不断加大,那种基于“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观念而进行的“即时腐败”,由于并没有太大的隐蔽性,很容易被发现和查处,于是,权力腐败便从技巧上寻求突破。“权力旋转门”现象就是典型代表。当权力和金钱已经跨越时空进行“期货交易”,说明权力腐败已经“期权化”。

“期权化”权力腐败的直接后果,就是权力腐败的隐蔽性更强以及反腐难度更大。一个当时没有收受贿赂的官员,其决策失误或者决策不公,至多涉嫌渎职侵权犯罪。虽然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调查数据,渎职侵权犯罪平均个案损失接近贪污犯罪的17倍,但由于长期以来未决侵权犯罪都被容忍和谅解的既定事实,没有“即时收益”的腐败行为,一般并无太大风险。这种情况下,为了降低自己的腐败风险和成本,官员倾向于“期权化”滥权在所难免。

专家将这种现象视为“权力过期不作废”,这种说法其实并不确切。因为官员用来谋取利益的权力,依然是其在位时掌控的权力,只不过权力的变现期,由其在位时转移到离任后,而且因为不在职位上,其所获取的“变现收益”,更容易逃避法律约束。

深究下去就会发现,“权力旋转门”之所以能盛行而且令反腐者鞭长莫及,就在于这种“期权化”在双方当事人间有着高度的默契度,很容易达成“攻守同盟”,按照说,作为“期货交易”的先行给付方,即权力腐败者,其预期利益能否变现存在巨大风险,因为“过期权力”从来都不是“腐败交易”的资本。但之所以另外一方会如期履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民主程序缺席之下,公权力已被“私有化”了,它并不因为某个官员离任而不复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完善行政权力行使的民主参与和监督程序,让权力的行使“去个人化”,就成为当务之急。当一个人的预期利益是拜法治和规则所赐,而不是官员个人的恩赐时,其根本不需要与某个官员进行个人费力的“期货交易”,而只需要和民主法治进行“现货交易”,而这正是法治和人治最大的区别所在。 志 灵

农民受益少比肉价更值得忧虑

近日温总理在陕西调研时说:“解决13亿人的吃肉问题还得靠农民。肉价涨一些有利于调动农民的养猪积极性,但涨到一定程度后要保持平稳,通过市场调节的办法,让农民养猪能挣钱,城里人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又吃得起肉。”

肉价飙升关乎百姓生活成本,总理体恤民情,令人感怀。透视这牵动亿万人的肉价,疯狂飙升当然令人忧虑,但笔者认为,更让人揪心的是,尽管市民为吃肉多花了钱,但农民并不一定是最大的受益者。

类似现象几乎已成了一种规律,在农产品供给链条上,最廉价的总是初始产

品,得到更多利益的往往是中间环节,最终买单的则是消费群体。有人测算,农民养一头猪卖掉后的利润是146元,而零售商卖肉利润则是养殖户利润的8倍。如此悬殊令人咋舌,显然,无论肉价是涨是跌,养殖户不仅没有受益最大,甚至能否收回成本有时也不一定。据媒体报道,养殖户的养殖成本从去年底开始不断上涨,养猪的主要饲料玉米价格持续攀升,比去年同期上涨16%,而出栏一头猪,仅饲料成本就比去年同期增加四十至五十元。两组数据如果比照一番,不免让人唏嘘。

抬高工业产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

格,这种工农农产品不等价交换的“剪刀差”现象,已经存在多年了。数字显示,农产品与农资价格增幅“剪刀差”,农膜、农药、柴油、种子等价格涨幅为两位数,而农产品价格涨幅不过1%~2%。其实,这反映的深层次问题是,“城乡分治、挖乡补城”的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因此,要破解肉价飙升农民却难受益的困境,除了加大农民的话语权,提高农民的市场博弈能力,以及整顿不合理的流通环节中更多获利,农民在国家的扶助下从市场中更多获利。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捍卫农民的切身利益。 王石川

据新华社